

微信扫一扫
游戏玩起来
看图猜成语

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背后秘闻

1967年6月17日,我国庄严宣告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成为世界上第4个拥有氢弹的国家。55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首那段历史,其中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节外生枝的降落伞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国随即开始了氢弹的研发。当时,对于氢弹的原理还是一个空白。科学家们只能在国际核领域的只言片语中细细寻找灵感、拼接零碎的信息。当时,我国唯一一台大容量计算机在上海。研究人员编完计算程序就往上海跑,计算完了回北京再编下一个计算程序。来来往往,直到把氢弹的数据准确算出为止。

1965年9月,于敏(中国氢弹之父、著名核物理学家)带领科研人员前往上海,对氢弹原理做进一步的研究。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大家一起讨论、研究、计算,逐步描绘出一幅氢弹反应过程的物理图像,形成了从原理到构型基本完整的氢弹设计方案。这段历史被称为上海“百日会战”。

试验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正式投弹前的一次模拟氢弹投掷中,悬挂模拟氢弹的主降落伞在空中撕破。研究人员心急如焚地赶到南京降落伞厂,结果生产厂房因武斗关停了。他们找负责人协商,谈此事的重要性、紧迫性,

以及对国家、对世界革命的影响,请他们立即恢复生产。最终,他们同意恢复生产。

新降落伞用专机紧急送到了基地,与真正的氢弹进行了装接,装接前还有一道最重要的工序——折叠降落伞。摊开的降落伞如一个中型会议室一般大,叠伞工人要拿掉身上携带的所有物件,且不断地检查衣扣有无脱落。如果有任何一件硬东西掉在伞里,后果将不堪设想。

特殊专列运输,中途“换车”

1967年6月5日,正式核试验用的氢弹加工生产工作顺利完成。随后,氢弹顺利通过各项评估,被分解装箱,从金银滩运往新疆罗布泊沙漠腹地进行核爆试验。

氢弹的主要构成包括弹体、热核装料、铀、炸药、中子源以及起爆装置,这些材料具有特殊安全性,不能用军用飞机运输,只能依托铁路。当时,用来运送的列车在外观上和普通列车一样。但实际上,这种列车的每节车厢比一般的列车要多4个轮子,以确保行进的稳定与安全。

这一特殊列车从青海发出后,铁路沿线就加强了警戒。据悉,此列车属于客货混合编组,自带餐车和硬卧车,这样就可以解决随车参试人员的吃住问题,从而减少停靠次数,保障货物安全。但有一种情况是不得不停靠的,那就是需要换车头和给列车上水。针对这种情况

况采取了3个安全举措:不和其他客货列车同时同地停靠;不允许不相关人员靠近停靠中的列车;用221工厂自带的列检人员换车头、给列车上水。

在专列运行过程中,保卫、运输人员与各小组安全员会对各自负责的安全部件进行检查。经过近两天的运送后,专列到达吐鲁番大河沿车站。由于当时尚未修建南疆铁路,因而氢弹不得不改用汽车运输。

转为公路运输后,运送队伍面临不少困难:首先是交通安全,因为沙漠自然环境恶劣,车队又很庞大,任何一辆车出现事故都容易引起连锁反应,牵一发而动全身;其次是天气炎热,时值6月,沙漠酷暑难耐,这对部分需要低温环境的部件是一大挑战;再次是需要防备不法分子甚至间谍的破坏活动。因此,遇到一些易出现交通事故的地段,开道车会提前设卡,指挥车队有序通过。当一些部件难耐高温时,负责同志会下令在隐蔽处适当停靠来降温。此时,护送部队会站岗放哨,高度戒备。

1967年6月8日,历经长途跋涉,氢弹终于安全运抵罗布泊马兰机场装配厂房。

惊魂的第三圈

1967年6月17日早上,执行空投任务的驾驶员徐克江驾驶726号轰-6甲飞机载着氢弹起飞,向核试验场区



方向飞去。

按照试验计划,飞机将在试验靶场飞行两圈:第一圈检查仪器、观察地形;第二圈操作各种程序,将氢弹投下。当飞机在靶标上空飞过一圈,指挥所的喇叭里传出口令:“注意了!第二圈将要投弹。”然而,众人看着飞机飞过第二圈后,却毫无动静,在场所有人心都提了起来。原来,负责投弹的第一领航员孙福长因为过度紧张,错过了按自动投掷器的时机,导致氢弹没有投下。

之后,徐克江请求再次进入靶标上空投弹。指挥所从喇叭里发出口令:“我们的责任是对人民负责,同意再飞一圈……”

没多久,飞机飞第三圈接近目标,在预定高度投下了氢弹。氢弹降到距地面2930米的高度时,只听一声巨响,天空出现了极强的闪光,紧接着轰鸣之声响彻云霄,核试验成功了!

飞机投掷完氢弹返回基地后,驾驶员、领航员、机务人员列队向聂荣臻元帅报告:“任务已完成!”华新

历史短波

刘伯承:征服苏联顾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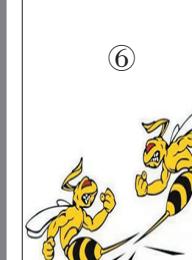
刘伯承在组建南京军事学院时,曾经聘请过一名苏联顾问。该顾问比较傲慢,经常指责中方学员不懂军事。有一次,刘伯承约他谈话,谈话中用俄语重点阐述了对俄国著名军事家苏伏洛夫十大军事原则的理解。该顾问听后对刘伯承的学识深感惊讶:“没想到中国还有人对苏联军事家研究如此深刻!”从此,这位苏联顾问的态度大为改观,再也不品头论足了。

陈寅恪:不被学位束缚

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问他:“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回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他游学西方十余年,奔走数万里,会说八种语言,但未曾获得一个学位之“名”。因其学问功底厚实,所在在清华课堂上才敢说“四个不讲”: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

陆贽:巧改皇帝罪己诏

唐德宗年间,有几个重要的藩镇反叛,京师缺粮少兵,德宗一筹莫展,只好下罪己诏,责备自己。德宗自己写了一篇,给宰相陆贽看,陆贽看后觉得不够诚恳,帮他写了一篇。陆贽在诏书中写道:“我从小生长在宫中,不知道下面的苦……老百姓日子过得不好、政局不安定,这是自己的过错,我必须挑起这个担子来,不能推卸给别人。我要把过去的苛捐杂税都免掉。除了叛军首领要治罪,我不责备跟随反叛者的军人。让我们一起营造一个崭新的局面吧。”这份诏书颁下,民心大悦,大家都佩服皇帝的坦诚,连反叛的军人都感动得哭了。



答案见下期中缝,也可关注“老年生活报”微信,回复“220727”查询本期答案(可扫描本报上方二维码)

7月27日
6版中缝答案
《看图猜成语》:
1、步步为营;
2、动人心弦;
3、力挽狂澜;
4、若隐若现;
5、卧薪尝胆;
6、远走高飞。

抗战到底,“底”在何处

全面抗战时期,国人齐声高呼的抗战到底,其“底”因人而异,至少有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收复东北失地、收复台湾以及彻底解除日本武装、实现东亚永久和平等四种不同意涵。

中共关于抗战到底的主张,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已经明确。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关于“中国的迫切任务”的提问时,斩钉截铁地说:“中国的迫切任务是收复所有失地,而不仅仅是保卫我们在长城以内的主权。这就是说,东北必须收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斯诺进一步询问:“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毛泽东明确答道:“不

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又明确宣称:“第三阶段是持久战的最后阶段,所谓坚持战争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程。”战略反攻要“直至打到鸭绿江边,才算结束了这个战争”。

至于蒋介石的抗战到底,虽然自全面抗战爆发之日起就宣之于口,实际上在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和战至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间,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举棋不定。特别是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蒋介石经历了以和为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到以战为主(完全胜利)的转变,其间既有以战促和的寄望,也有被迫应战的无奈。 桑兵

红军曾禁止官兵吃辣椒

20世纪30年代的中央苏区有四大常见病,其中疟疾、疥疮、痢疾就不说了,还有一种中央苏区独有的“常见病”——下肢溃疡。当时苏区红军战士常年靠量少且缺盐的竹笋和辣椒下饭,吃不到新鲜蔬菜,营养极度不良。其后果是蚊虫叮咬后一挠,只要皮肤有破损,就极易感染;同样,行军中被荆棘刺到,也是件不折不扣的生死大事,往往第二天伤口就坏死成酒盅大,第三天又变成茶杯口大,甚至踝骨外露。

在赣东北,有的县十分之九的农民患上苏区四大常见病,亡者五六千,某些地区的机关都快停止运转了,因为人员大部分病倒,没有人主持工作。

为了“治”病,苏区也想了很多办法,常规做法大家

都能想见,就是改变当地村民的卫生习惯,不把便桶放在卧室,厕所不建在水井旁,不喝死水、塘里的水……

此外,红军方面能做的几个措施之一,就是严厉禁止官兵吃辣椒。因为辣椒会刺激肠胃,诱发肠炎、痢疾。苏区当时组织创作的《四不五要三努力》歌曲中,“四不”的引申要求就是“不吃辣椒”。要做到这一条不容易,因为苏区红军部队官兵绝大多数是湖南、江西等地人。作为应对,有人悄悄在饭里灌辣椒水,俗称“打埋伏”。而部队干事会准备一个小饭勺,发现谁可能灌了辣椒水,就舀他一勺尝尝。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等人本来非常爱吃辣,但为了表示支持,也都不吃辣椒了。胡佳恒